



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

# 陈元晖教育文集

分册主编 王炳照

丛书主编 顾明远  
丛书副主编 袁振国  
朱永新  
张胜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E  
人教有书馆  
HUMAN EDUCATION PRESS

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

# 陈元晖教育文集

分册主编 王炳照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元晖教育文集 / 王炳照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1.2

(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

ISBN 978-7-5499-0117-3

I. ①陈... II. ①王... III. ①教育学—文集 IV. ①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6710号

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  
书 名 陈元晖教育文集  
丛书主编 王炳照  
责任编辑 司亚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盐城市纯化路29号(邮编224001)  
电 话 0515-88153008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 页 6  
字 数 460 000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0117-3  
定 价 58.00元  
批发电话 025-83657791, 83658558, 83658511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mailto: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551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 总 序

我国教育历史悠久,渊源流长,但是近代教育在我国的产生不过是近一百年多的事情。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介绍西方教育理论,开展众多实验研究,为我国教育跟上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和教育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可惜抗日战争打断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教育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教育科学研究也逐渐恢复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科学迎来了明朗的春天。从引进外国教育理论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这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但又是一项十分壮丽的事业。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正在不断探索前行。

任何科学的发展都要靠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创新,教育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因此,了解前人研究的成果,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就使我们的攀登会容易一些,快捷一些。为此,我们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第一辑选择了刘佛年等8位教育名家。这几位教育名家是我国教育科学现代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们大多就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人都在国外留过学,可以说都是学贯中西。建国以后,他们为新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的甚至受到打击迫害。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焕发了青春,积极投入到教育学科建设之中。他们是我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现在教育理论界的骨干,可以说都是他们的学生。

他们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没有直接受教于他们,但是他们作为前辈

对我的影响、帮助和扶植,我永远铭记于心。例如王焕勋教授,我自从1956年回国以后,一直在他领导的教育学教研室工作。1958年他任北师大附中校长,又把我调到他身边,在他领导下工作4年之久。他对我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又如王承绪教授,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就是在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几乎都会叫我去主持,给了我许多学习的机会。而且值得提到的是,每次去杭州,他都要到机场去接我。王老师不仅给我学业上许多帮助,他的人格也给我深刻的影响。滕大春教授、刘佛年教授都给我说不尽的帮助。滕大春教授还说我们是忘年之交,我们的感情已达到亲授弟子之谊。因此,我是怀着对前辈的敬仰之情来主编这套书系的。每册主编也都是该名家的亲授弟子,由他们对内容加以精选。因此,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必将丰富我国教育科学宝库,名家的道德文章必将对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以教育和启迪。

陈元晖

2010年5月3日于北京求是书屋

## 前 言

去年9月份,我带领学生承担编选“师大教育讲堂”的任务,时间横跨师大百年历史,选择曾在此弘文励教的教育名家的代表性文章,编选成册,陈元晖先生当然在列。重读陈先生的文章,脑海中浮现出陈老的音容笑貌和殷切嘱托,心中有种欠账的感觉。年后不久,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金月娇同志找到我,希望我能编选陈元晖先生的文选。我当时曾有点犹豫,一是1992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已出版了《陈元晖文集》(三卷本),大部分文章已收入文集中,是否存在版权等一系列麻烦问题;一是我的各种“任务”繁多,害怕抽不出太多时间来做这件事。金月娇同志很是执著,几次三番沟通,我后来想,编选一本容量适当、比较有代表性的陈先生文选,可能对年轻学者认识、继承陈老的遗志,是有益处的;而且编选陈先生文选也是对自己的督促,就答应了这件事情。

陈元晖先生是我读研究生的授业恩师。作为陈老的学生,我特别高兴能承担为老师编选文选的工作。早在2000年,我曾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编选了陈先生的《中国教育学史遗稿》。但这次编选陈先生文选,我却感觉到了一些压力,陈老贯穿古今、融会中西,他在教育学、中外教育史、心理学、哲学领域等都有脍炙人口的著述问世,且都能俨然成家,陈老有时也戏称自己为“杂家”。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教育七十年》、《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等在教育学界堪称标识性成果;他的《心理学的方法学》、《论冯特》以及有关巴甫洛夫、皮亚杰的研究在心理学界享誉甚高;他有关王国维史学研究方法、康德哲学的研究在史学界与哲学界也有不小的影响。究竟挑选哪些文章?挑选出来的文章是否能比较全面地

反映陈老“杂而成家”的学术风貌？我很费了一番心思，总算有了一个基本策划。

本文选主要汇集了从 1956 年到 1991 年之间陈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包括四类：第一类是文化与哲学研究，如《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70 周年》、《论文化的四种性质》、《论濡化》等；第二类是教育学与教育学史，如《中国教育学 70 年》、《教育实践与教育科学》、《科学与教育学》等；第三类是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如《心理学的方法学》、《皮亚杰论儿童的逻辑思维》、《教育心理学》等；第四类是中外教育史研究，如孔子教育思想系列研究、《康德与近代西方教育思想》、《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也编入其中。可能这种选择依然会是挂一漏万或有不妥之处，但也只能大致如此了。

作为陈老的学生，我深知，陈老始终认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学，他一生奋斗、执著追求的目标是提高教育学的学术质量和科学水平。陈先生在晚年，几乎将全部精力用在构建“中国教育学史”上。他在《中国教育学 70 年》一文中指出：“所有已出版的《教育学》教科书，几乎一致的没有对中国的教育经验进行总结，包括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我们还没有一部‘教育学史’，介绍中国各个时代的教育名著。我们的中国教育史，只注意教育家一点一滴的思想和各时代的教育制度，没有系统地介绍各个时期的教育学者的教育理论，如《论语》、《学记》等教育理论名著。如《学记》上所说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 12 个字，在中国的《教育学》教科书中应该有专章阐明这一辩证法的教学理论思想。我们有时也引用了这 12 个字，但只是像蜻蜓点水一样，一忽而过，这不是‘总结’，而是一种‘点缀’。”陈老多次指出教育学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学史是教育学是否科学化的风向标。他认为：“教育学史就是研究教育学这一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教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的历史，及其如何从其他科学独立出来的历史，研究它的独立史，研究教育学怎样摆

脱经院哲学的历史,研究它从自然科学中怎样汲取方法上的指导的历史。教育学史应独立地成为一门科学的历史,这对于树立教育学家的信心及今后发展科学的教育学都是必要的。”

在教育史界,由于长期没有明显的学科分化,大家一直以为或致力于教育本身发展历史的研究,而实际上教育史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部分是教育活动本身的发展演变,大部分却是历代教育家对教育认识的发展演变。因为研究教育活动本身的历史所能够依据的事实十分有限,只能大量依靠前人遗存的文献,而这些文献除直接记录着教育本身的事实之外,更多的是前人对教育的认识。但是,这些文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教育活动的真实性,是需要检验的,而检验的客观依据又往往是不足的。而一旦将文献研究误以为就是研究了教育本身的历史,常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对此,我常常困惑。

编选这个文选,也是对我的一种督促,督促自己尽快完成手边的各种杂活,试着动手去写《中国教育学史》。陈老在生前多次给我讲过这个事情,我一直不敢作任何回应。一是深知《中国教育学史》工程浩大,我当时已年届花甲,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精力难以保证;二是我很希望能有青年才俊奋起承担这个任务。这些年来,一有机会,我都会把陈先生这个遗愿讲给身边的学生、青年教师们,希望能有青年学者“继其志”,也算是替我还了这个“欠账”。十多年过去了,教育学史和教育史学研究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郑金洲、瞿葆奎先生的《中国教育学百年》,杜成宪、崔运武和王伦信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杜成宪、邓明言的《教育史学》等都是翘楚之作。我常常在想,这是否意味着大家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教育史研究既要研究教育本身的历史,更要研究对教育认识的历史,并且将两者的研究引向深入?

陈老最初提出“教育学史”这个概念,其初衷是希望写一部中国教育学史,从学科层面上清理中国学者对教育认识的发展历史。他说:“我先



做好一头一尾,中间的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剩下的由你们来做。”陈老以《礼记》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发端,从教育学的角度对《学记》、《大学》两篇进行了解读,写成了《〈礼记〉新读》;将中国教育学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到1989年70年的发展历史作为尾巴,写成了《中国教育学七十年》。郑金洲、瞿葆奎先生的《中国教育学百年》从近代中国教育学科初创开始,用元教育学的视角对学科的发展进行分析,我将其视为是对陈先生提出的“教育学史”的继续探讨。但是中国教育学史研究依然有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教育学以独立的学科形态出现是从近代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古代教育学如何定义与表述?由于没有标志性的概念,在历史文献中虽然有教育名篇,但是没有形成有体系的教育著作,教育学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发展状态。而且最著名的教育家未必有教育学的专著:董仲舒、王充、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著作不能理解为教育学论著,近代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也没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论著。这些如何定位?如何将他们对教育学的认识归纳到系统的教育学史中去?对此,我仍然困惑。

近些年来,我一直暗暗在为《中国教育学史》的撰写收集、准备着一点资料。在指导学生们论文的过程中,我对古代教育家的论著进行重新研读,作了不少读书笔记、心得;2008年第二学期,应劳凯声教授之邀,为教育学博士生开了“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历史意识”专题讲座。我认为,就教育史研究领域来讲,前期在教育思想史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教育学史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换句话讲,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与发展历程,从而形成思想发展史,其本质是对教育认识历程的记录。从思想史上升到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就形成了教育学史。我以前主编过《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有了这个积累,我对撰写《中国教育学史》还是有了一点底气。

我准备以编选陈先生文选为契机,来“迫使”自己下定决心,动手做《中国教育学史》,原定计划从暑假起就开始动笔,天不遂人愿,在7月下

旬查出顽症，随即住进医院。我只得将手头的工作暂时放下，将陈先生文选的工作交给我的学生们去做，他们将陈先生的文选一篇篇整理出来，拿到医院里来给我看。在编选文选的过程中，施克灿、周慧梅博士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假如将来身体允许，我还希望能将陈先生这个心愿继续下去，能将《中国教育学史》向前推进一些，哪怕一小步；至于能否完成这个陈先生留下的未了心愿，能完成多少，不好妄求，要看马克思什么时候让我去报到，我服从“组织分配”。从我的人生历程来看，我一向是服从“组织分配”的，在俄院读书两年，响应组织号召，转学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重新从大学一年级读起；毕业后又服从“组织分配”进入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学习；“文革”刚刚结束，以为自己也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我却又被“组织分配”到北师大文科学报做编辑工作 17 年，将近花甲之年才又服从“组织安排”回到教育系教书。我常常给身边的学生讲，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当年陈先生的心情，真的是要与时间赛跑啊。

最后，我还是想重复我写在《中国教育学史遗稿》出版之前的那句话：“希望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继续完成他未竟的心愿，继续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教育学界摒弃浮躁、功利的心态，青年学者能奋起担当，树立起历史辩证的学风，中国教育学史的问世，就为期不远了。我踮望着。

王炳照 北京师范大学

2009 年 8 月口述于北京肿瘤医院

# 目 录

前 言	001
-----	-----

## 文化与哲学研究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70 周年	003
论文化的四种性质——兼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017
论濡化	034
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节选)	042
严复和近代实证主义哲学——严复是中国第一代实证主义者	073

## 教育学与教育学史

中国教育学 70 年	085
教育学不是记问之学 而是使人聪明之学	143
教育实践与教育科学	154
科学与教育学	158
“一般系统论”与教育学	167
“三个面向”与教育改革	181

## 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

心理学的方法学	199
皮亚杰论儿童的逻辑思维	250
教育心理学	271
《社会心理研究》发刊词	279

## 中外教育史研究

卓越的教育思想家——孔子·····	285
孔子的德育思想·····	295
孔子的美育思想·····	315
康德与近代西方教育思想·····	323
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节录)·····	339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	358

## 附 录

附录 陈元晖先生年谱·····	413
编后记 ·····	419

# 文化与哲学研究



#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70 周年<sup>①</sup>

(1989 年)

## 一、引 言

70 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古稀”之年,杜甫的名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感叹 70 岁的人的稀少。70 年,对国家说,只不过是一瞬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做一面镜子,看清自己的尊容。70 年前出现过的事实,能否算作古?是否从 70 年之前出现过的人物看出得和失?70 年不能算“古”,现在仍健在的人中间,就有不少人亲眼见过五四运动,其中的少数参加过这一伟大运动。70 年虽然不算古,但这 70 年却是震古烁今的时代。本世纪刚进入第 11 年,延续 2 117 年的封建帝王专制制度(从汉代算起)一举被推翻,8 年后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之后 30 年,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虽然 70 年对国家、民族只是一瞬间,但这一瞬间的历史意义,超过以往两千年。因为这 70 年,是划时代的 70 年,封建专制制度处于不合法的地位,而人民可以当家作主却是合法的。不管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程度,但毕竟它是合法的,人们都必须尊重这种地位。违反人民利益的事,当权者是不敢公开干的。这种合法的地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得来的。得来是不容易的,保护也是不容易的。70 年的时间短促,但它是新时代的 70 年,是与过去两千年截然不同的 70 年,无论在政治制度上、文化形态上、经济政策上,都应该进行系统的总结。70 年时间虽然短,但它一样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看出兴替,看出得失。40 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出版过不少种、不少册,但却缺少一本文化史,缺少这样一面文化镜子,照出文化方面的兴替得失。梁启超晚年曾开始执笔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但未写完即赍志而歿。一本通史,内容几乎全是政

<sup>①</sup> 原收入《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编。

治史,没有文化史的内容,经济史的内容也不多。没有文化能形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吗?但我们读到的大多是没有文化史。应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写出一本中国文化史,让读者们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看到兴替和得失。这是学术界刻不容缓的事业。写中国文化史要先从这70年开始。

文化问题,现在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文化”这一概念包括哪些内容,是否有一致的看法?文化与教育有无区别?从空间上是否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又是否可以分中学和西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呢?可不可以把文化分为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全盘西化是发展中国的途径吗?从时间上是否可以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文化是否具有再生性的特点?根据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评估文化?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怎样?这许许多多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尚未解决、尚在争论中?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写出一部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史书,对这些问题都必须先加考虑。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经过整整70年了,是总结经验的较好时期。总结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将给今后发展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比较科学的指针,避免以愿望代替科学,以纷争代替共识。

## 二、论文化含义,兼论教育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这一词,最早见于汉朝刘向所著的《说苑》上,含义为文治教化。他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sup>①</sup>这里“文化”是与武力对称的一个词,不是现代的“文化”含义。

现代的“文化”是指社会文明进步的总称,包括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所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成绩。具体地说,是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的总合体。台湾省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sup>②</sup>有的学者还把“意识形态”包括在“文化”这一概念之内。“文化”又是考古学上的名词,指用同样的工具制造出具有同样技术水平的产品的一个历史时期,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又是人们口语中常用的一个词,如此人有文化,此人文化水平高,学习文化等等,这里“文化”一词,仅仅是指知识水平或识字能力。“文化”一

① 刘向:《说苑·指武》。

②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自叙。



词用在革命运动上,说明它不同于武力革命,不同于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但它是具有群众性的,并且最后也能殊途同归,共同达到革命目的。

五四运动一方面是指群众的革命运动,一方面是指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群众革命运动发动之前,它起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思想教育的作用。在群众革命运动告一个段落以后,它又发挥了巩固革命成果和发展革命成绩的作用。五四群众革命运动是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发动起来的,但新文化运动早在它发动的前几年就已经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动员,一个大学——北京大学和一个杂志——《新青年》的功绩,是不会被忘记的。1919年1月,《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即号召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两位先生共同的敌人是国粹和旧文学,所以就从文学方面为突破口,陈独秀发表了《文化革命论》,胡适也在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至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所作的《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及《劳工神圣》的演说,都起到动员的作用。五四运动的目的是要求科学与民主,这些目的,都在事前的动员和宣传上,广泛地谈到了。国粹和旧文学,是维护专制政治统治的工具,又是愚民的手段,选择这里为突破口,以后的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革命起到思想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这同样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发展今后社会主义文化应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做法是可以继承的,哪些做法是应该否定的;是否也可以像对古代传统文化那样,一方面继承,一方面批判,是不是也要分清其精华和糟粕,继承其精华,摒弃其糟粕。这些问题都应该结合历史经验、结合当前实践,进行科学的总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运动的关系,应该作为总结经验的一个重点,但过去写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则多偏重于文学革命运动、政治运动或科学运动的经验。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运动是分不开的。文化运动落到实处就是教育改革,而发展科学也同样是这一个道理。

“文化”是一个新名词,它是从 Culture 这一个外文字意译过来,它作为“文化”解,也作为培养、教化、教育、训练等解析。这个词本来的含义是耕种。现在文化的含义扩大了,变成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习惯的总称。而 education 一字是“教育”,同样也可以作训练、教养、修养、培育、培养解。所以从字面上解,外文的文